

# 第一章 居 都

## 第一节 生境概况

“居都”是一个地名。这地方很小，如果人类文化是一个巨大的整体，那它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细胞而已。但它一旦从人类文化的历史大背景中走来的时候，就能赋予我们人类文化的一般的和某些特定的意义。居都实际上也是如此走进我的视野的，并且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和同仁们的帮助，让居都也如此走进贵州的、中国的、乃至世界的人们的视野。

从地理上说，居都这个小村子位于贵州省西部六枝特区境内。在六枝特区，它又位于六枝的西部，在六枝特区与水城特区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这是一个不到 100 户人家的自然村寨，但这个自然村寨又是一个行政村<sup>①</sup>的称属。作为行政村的居都，还包括旧寨、

<sup>①</sup> 中国的自然村和行政村都有自己特定的概念。自然村是人们于自然状态中，十户、二十户相聚而居，就可称为某某村寨。而行政村是政府为了行政管理上的需要，结合自然村落的分布、土地面积、人口，以及文化联系等方面的因素，把某一片的几个自然村归为一个行政村，并选择一个有“中心”意义的村名为此行政村的称谓，居都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岭岗、松林、居都垭口、坡头等自然村落。居都作为一个中国山区的行政村，它有 200 多户人家，近 1000 人口，像许许多多贵州山区的村寨一样，贫瘠的不多的土地就分布在这些村落的陡坡上。这里的山地非常陡峭，是贵州高原与云南高原接触过渡中的部分。由于挤压，这里的地表比贵州高原的其他地方都折腾得厉害，使这里的山坡基本上都呈 V 字型。在这样的山坡上，耕地被弄成小条小条的梯地，从坡脚一直到坡顶。居都的居民像其他许多地方的居民一样，就是依靠这些坡地和坡脚溪流边的少许山田，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

在这样的山坡上，之字型的羊肠小道成为山上和山下的通道。我到居都不久，有一天在山坡上行走时，带路的一个居都老头夸奖我说我走路还“挪还”。我最初对“挪还”的夸奖百思不得其解。好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下坡时你不能脚尖朝前，而得把脚的外侧或内侧横过来，一点一点地往下移动。如果这种移动准确迅速，那么居都人就会说你“挪还”。在这样的山间山沟底一般是一条小溪，溪边稍平展的地方多被开垦成了山田，再往上就是梯地、坡地。在山上石头的地方，如果完全是一片片的岩石，那这些地方就是灌木、杂草，间而有几棵从石缝里挣扎着生长了数百年或上千年的古树，苍老而委顿。如果这里有石头也有土壤，那这些石头间的土壤也会被山民开垦，成为贵州山区独有的土地——石旮旯地。这种土地最大的可种百十棵玉米苗，小的只能种一棵玉米苗。

在这里，还有一些多为砂石的山坡，多少年来在砂石的缝里靠风化的一点点“石泥”和“植物的尸体”生长着一些草和小灌木。这样的山坡，成了山民们的牧场，而这样的牧场，只有山里土生土长的山羊和黄牛能于此生存。你如果不相信，那你去亲眼看看，那一头头黄牛如何“挪还”走过山间的羊肠小道，如何一步一步挪过悬崖上的小径，如何把不小的身体拉直，又如何收拢，以对付一个个

深沟、大坎、土堆、石磴时，你就会为这“生命的舞蹈”而赞叹了。

这里的山上是有树的，以前也曾是满山遍野的大树林，树林中凡青葱茂盛者，这里的人就称为“箐”。后来，由于工业建设，由于人口增加，还有人人为的毁坏，树林渐渐消失，现只剩下不多的一些小树林。东一处，西一处地在回忆往昔的繁茂。往昔，这里的人大概只耕种山间的梯田和某些稍平展的台地；而现在，连种一棵玉米的石旮旯地也不会放过了。

就在这样的山间，如果半山腰上出现一个较大的台地，一般来说，也就会出现一个自然村寨。居都就是这样的一个村寨。这也许与贵州许多山里人生存的地方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每一个这样的人们生存地和生存空间，我相信都有其自身的理由和历史。这在作为一种文化“残片”式存在的居都就更是如此。

## 第二节 调 查

1949年，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新中国成立，除了一系列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意义之外，在文化历史上，她还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具有极深远的意义：一是把“男女平等”的字眼写进宪法，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男女平等；二是各民族平等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第一个方面不是此处的话题。第二个方面在某些方面和某些地方，良好的愿望与实际的情况在过去和今天都有一定的差距，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友好相处，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现实存在。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53年举行了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在这次普查中，贵州的仡佬族人口统计有11667人。这些仡佬族人口申报，当时多来自于贵州西部的两个地区：安顺、毕节。据说，当时这两个地方申报的仡佬族人口是全省仡佬族人口的90%。据调查六枝、安顺、平坝等地的仡佬族老人，他们说他们当时申报为“古老族”后经一些

专家认定为仡佬族。据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在 1953 年时，仡佬族人主要是由安顺、毕节等地的“古老族”（仡佬族）人构成的，是他们构成了当时在中国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之一。现今中国的仡佬族人口大约有 47 万，在贵州约有 45 万人。45 万人与 1953 年的 11667 人相比，是一个意味深长故事。这里有一个关于贵州仡佬族人口在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中数字变化的情况：1953 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为 11667 人；1964 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为 26235 人；1982 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为 51521 人；1990 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为 430519 人（按 10‰ 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估计 1995 年贵州的仡佬族人口为 45 万人左右）。从这里不难看出，1982 年的 51521 人是 1953 年的 11667 人的自然增长数字，而 1990 年的人口数就不是自然增长，而是一种机械增长的数字。这种机械增长来自于“民族识别”，即从其他民族中识别出了原来应是仡佬族的人口。这种“识别”在贵州是从 1984 年开始的，仅在务川、道真、石阡、正安等四个县，一次识别就使仡佬族人口增加了 24 万人，再加上其他地区的识别和几年来的人口自然增长，就使了贵州的仡佬族人口达到 45 万。

罗列这些数字，表面上看与这个小小的文化细胞性质的居都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但实际上居都与这样的民族人口大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并有一种特定的意义。因为 1953 年全国人口普查出的 11667 人中，居都的数百人口，是其中最宝贵、最为特殊的一部分。这一时期，六枝（当时称为郎岱县，隶属安顺地区）申报为仡佬族的约有 2000 人，并在当时的申报中，基本上都申报的是“古老族”（后经专家认定为仡佬族）而称“古老族”（情绪最直率和最强烈的应当数居都人（这一事象我们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展开）。不仅如此，它的意义还在于，在绝大多数的仡佬族地区和仡佬族人都丧失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她至今还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如今的六枝特区总计有仡佬族人口 8000 多人，也只有以居都为中心的几个村寨相对保持着自己的语言。其中完整地保持着仡佬语言，并且仍

在完全使用的是居都。另外，1953年最直接最不隐讳什么申报自己族属的这一万多人，还有更深一层的历史文化意义。这就是：他们基本上属于北盘江（古称牂牁江）流域内的居民，多有一份历史地域文化心理上的遗传影响。北盘江流域，特别是北盘江的上游地区，不管是“大夜郎”时期还是“小夜郎”时期（另外一说称“广义夜郎”和“狭义夜郎”），都是现今人们普遍认为的中心区域或腹地。1953年申报的这一万多“古老族”（仡佬族）人，也就是以这一地区为中心分布的。现今的仡佬族，不管是最初的“申报群”还是后来的“识别群”，都自认为和人们普遍认为是贵州最古老的百濮民族最直接的后裔，或最直接的后裔之一。也许，这些若游丝般的联系对今天的仡佬族并没有什么切实的意义，某些相关的争论也是一种虚妄，但于此的人类文化解读和阐释却也得从这里走去。实际上我也是如此走向居都的。在我作为一个渴望解读和研究居都的学者走向居都前，并不知道居都在文化人类学方面会有什么意义，只能在过去和遥远，以及相关的事象中寻找它的支点，但最终的一切答案，只能在现实的居都中寻求。

我是在1995年的1月突然地闯进居都的。说“突然”一点也不过分。1995年的1月30日是中国农历年年的年节——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只有有“毛病”的人才会在这个时候闯到这贫瘠寒冷和陌生的地方来。实际上，居都人也是这样看我的。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辛劳，居都的文化事象也居然能一一展现在我的面前。

在居都住下之前，我到过居都两次，那时居都也就走进了我的视野。居都不通公路，虽然它附近就有铁路和省际公路通过，但它在交通上是闭塞的。我在距居都最近的一个公路点上下车，也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居都；同样，在最近的一个火车站下车，也要步行两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居都。按行政区划，到了一个叫居都垭口的地方就到达了居都行政村的地盘，可这里距居都村还有好几

公里，要越过两道山脊，才能下到座落在一个山腰台上的居都村。居都所在的这座山叫马脑壳山，居都村就处在山的“肚子”上，往山后的左边走是一个叫“坡头”的自然村寨，往右边走就是居都垭口；前面的左手边是陡峭的乱石坡，直下到深深的马脑壳河，然后又是 V 字型的陡峭的石坡。在石坡的一个台地上，又住着一个与居都隔河遥遥相对的彝族村寨；前面右手向下倾斜，下完了一个沙土构成的陡坡后，从山沟上来，上面形成一道与居都相望的起伏的山梁。梁上有三个自然村寨，叫松林、岭岗、旧寨。在这三个自然村寨的背后，又是一座高耸入云不通鸟道的大山。在马脑壳山的后面，是一座高大无比、云封雾绕的大山，人们叫它为花赖大山。这座大山方圆数十里，把居都的整个东北面，用百丈高的悬崖挡得严严实实的，而在居都的西南面，又是一条深深的大沟。整个居都就这样被四周的大山和深沟环绕着，只有一条小路歪歪斜斜地从花赖大山边绕过来，进是它，出也是它。这只是现今我们面对的现状，如果回溯到数十年前原始森林和原始次生林还封住整个山区的时候，这样的地理环境更叫人称绝。正是这样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保存了某些这个民族在其他地方难以保存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从地理上走进居都时可以用得上“发现”这个字眼。在今天，居都的山前山后由于历史的人口的种种原因，原有的森林基本消失了，山区的隐蔽性大大减弱。但尽管如此，当我第一次在山脊上接近居都时，并不知道我的脚下就有一个叫居都的村寨。这种情形如果在数十年前森林茂密的时期，更是如此。那时，整个的居都全掩蔽在一片树林和竹林中，只有进了寨子，听见狗吠声才知道此处有人烟存在。

同样，我从文化人类学上走进居都时，也可以用得上“发现”这个字眼。因为当你走进居都村寨，这里并没有作为一个民族外在的常有的表现，如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服饰、相应的音乐、舞蹈，以及一些特异的风俗。只有一些与其他汉民族村寨无多大相异之处的一

般景像。可是，一旦你透过一般的表面现象，你又会看到这似乎平淡无奇、毫无特殊之处的表面现象下，像地理环境掩蔽居都一样，掩蔽着居都和居都人众多的、系列的文化事象，并拥有多个方面深刻的意义。1948年，德国的一个叫做鲍克兰的女文化人类学家，就只身一人到过居都附近。可她只远远地观察了这个村寨，并在另外一个村寨附近，向别村的村民打听过居都。但她只是看见了居都，却没能“发现”它。我最初从外象观察这个村寨时，心情不会比鲍克兰更好，收获也不会比鲍克兰更多。我之所以说“发现”是因为我最终还是走进了居都。

这大致是地理生态环境对居都的意义，它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山区的民族一样，许多方面受到地理生态环境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这样的地理生态，就不会有作为地理上的村寨居都，更不会有作为文化体的居都。这方面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述。

我进入居都之后，实地的调查是从居都这个自然村开始的。这个自然村约有90多户人家，人口近400人，基本上都是仡佬族（这是官方称呼，他们至今仍自称古老族），只有数户的男方或女方为汉族，而纯粹的汉族人户和其他民族人户一家也没有。房屋建筑多为长方形、人字顶的木、竹、石结构的草房，瓦房有数栋，但多是最近几年才盖起来的。土地情况如前所述。耕作方式是原始的人力和畜力，粮食收成不丰。副业是竹编织，这是绝大多数居都人家都要和都能从事的一项副业，年年每家都能于此上有一定收入，但收入并不丰盈。民族文化的事象变化很大，表层文化的事象尤为如此。服饰全部汉化，一些风俗发生了较大转移，表面上的风情已经极其淡化。但语言还相对完整，基本的性格和气质还相对顽强地存在。一些较为原始的文化遗留还能搜集一些，如一种灌木纤维织成的传统的土布、乡土特色浓郁的背扇等。它的婚俗和丧俗虽已有一些变化（特别是现今几乎一如汉式的婚俗和丧俗），但大多数的古老事象还在。“祭山”和“吃新”等，在整个民族的观念中还具有重要

的地位，对古老的回忆他们基本完全模糊，但植根于他们文化遗传中的信息却很鲜明。

对居都的调查应该说是“全方位”的，也可以说是对一个“文化生命体”的全面观照。在立足居都这一自然村寨的同时，也把视野投向它周围的仡佬族村寨，故而在论述居都时，大致是一个“大居都”<sup>①</sup>的概念，即以居都为中心，包括周围的数个自然村寨，拥有1300多人的仡佬族人文化共同体。实际上，他们在不久以前，确实为一个共同的整体，是后来的行政区划才使他们相对地分属于不同的行政村。

### 第三节 历史探寻

居都是仡佬族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村寨。仡佬族自然有自己很古老的历史，但它与居都人的历史又不是一个概念。它的历史是一个一定区域文化共同体形成、发展、演变的历史，表述它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奠定研究居都文化的基础。

“居都”是这个村的名称，是什么人和以什么方式赋予它的，现今没有人能完全说清楚。外人的一般看法说这是仡佬语的汉语译音，问及村民，他们均不以为如此，因为仡佬语的“鸡”的音为“革”。后来，又有一种说法：说居都所在的这座山像只鸡，村子正好座落在鸡的肚子上，所以称为“居都”，取意村子处在鸡肚子上。这个说法符合汉族人取名要包含一定意义和意象的习惯，但居都人又普遍不承认此村名是因为什么原因由某汉人“望山生义”而取的。他们对此村又有一个真正、完全的仡佬语称呼，叫“楼善”，而这个“楼

大居都的认定是以文化共同体为基础的，指的是前面所说的作为行政村的居都，另外再加上附近属于另一个行政村侏那的200多仡佬族人。

善”的称呼在他们说来并没有什么确切的象征和含义。他们自称这只是一个“声音”只是一个地方随意的名字而已。在居都人为他们的子女取名字上，也有许多例证可以证实居都人的这种习惯和行为。这种行为可称为名称的非意象化、非寓意化，是居都人佬佬语言思维深层的无意识的某种结构的“露头”。它表明居都人表现在语言行为中的许多东西，与汉语中的语言行为是很不相同的。

居都人还以为他们的村名是很早以前就如此称呼的。这倒是事实，就在村子的后山上，我们查访到一座杨姓的墓碑，上面就有居都地名出现年代的证据。碑上有这样的字样：“大清道光庚子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立 正月二十五日在于居堵寨告”。道光庚子年（1840年）距今已有150多年了。这说明在道光年间或此前，此地就已经成寨并有了与今天相同的寨名了。但“居堵”和“居都”还有一定的区别，“居”字相同而后一个字就有差异了。这“堵”字的音与“肚”的音要更近似一些，而“都”与“肚”的音却有一定的差别。按标准的汉语音的读法，把“肚”读成“堵”更符合实际情况。故从这些情况看，我以为居都这个村名，大概包含了这样一些关于居都村早期或中期历史的信息：

一是最初取此名的很有可能是操汉语的汉族人，而且此人在居都最初的一批立寨者中有相当的影响。当然也有可能取此名者与当初的直接立寨者无太直接的关联，只是因为某种原因和方式，参与了居都名字的命名，但这个人也一定是个操汉语的汉人或与汉语有很直接关联的其他什么人。二是最初的状况如果如上述前者，那么，最初来此立寨的迁徙者一定就有某种构成形式。这在后面我还将论及。三是居都这一名字最初也有某种来自操佬佬语人的定名参与和后来的广泛认同。

当然，居都这一名称的出现也许比以上关于居都名称最初出现的猜想还要复杂，也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但它都与居都的历史相关联。

在居都的名字上，“居都”和“楼善”是一相对应的东西。官方和所有的“外人”都知道“居都”这个名字，“地方”的名册和“外人”都这样称呼它、记录它。“楼善”也是居都的称呼，但它只为居都人和附近的族人和“自己人”知晓和使用，“外人”和官方是极少知道的。从这一情况看，“居都”好像是一个来自外面的汉人（外人）对此地的汉语称呼，而“楼善”则是居都人自己的仡佬语称呼，前者是他称，后者是自称。如果真是如此，那许多问题就不言而喻了。但居都人却不是这样看的。他们普遍认为：居都也是他们自己对此地的称呼，决不是他人所为，更不是“在原有‘楼善’名字的基础上而取的他称”。他们自己对这两个名字的解释是：居都是我们自己叫和让外人叫的，而“楼善”是为了防止“外人”了解他们说话的真实内容、含义时才用的名字。这可能是对的，但“楼善”此名还有一个功能，即同族同种的认同标识，说居都大家都能说，你我可以是同族，也可以是不同族，但如果一说出“楼善”或“楼善人”，那么，这种标识就发着光出现了，两个仡佬人就会心领神会地相似而笑。另外，居都是居都人自己的村名，但毕竟是他们的第二母语——汉语的称呼，出于语言发生和自我保存的机制，仡佬语也得对居都有一个称呼，这就是“楼善”。至于居都和楼善的村名最早起始于何时？二个名字谁先谁后？这些都不得而知。现在，也没有谁有能力知晓这一切。

在山区，人文的历史记述非常贫乏。直接记录地方历史的是县志。在富裕和交流广泛的书面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县志是绝不可缺少的东西，可这在贫穷闭塞书面文化不发达的山区就大不一样了。县志在这样的地方某种程度上是可有可无的东西，故而它可能在有的地方有县志，有的地方就没有；有县志的地方也可能记述了某些年代的历史，而有的年代就没有记述。就算是有县志并有记述，也是很狭窄和表面的。这是针对一个县而言的，具体到某个村，其人文历史的记述的“贫瘠”就可想而知了。因此，要在这样的人文历史记述中，搜寻到关于居都的只言片语是根本不可能的。探寻居都

村的历史记述当然还有另外一条路子 那就是“家谱”。家谱是中国汉族人一种特有的人文历史记述方式。在汉文化四处“扩张”造成广泛影响的时候 许多原来没有“家谱”概念的其他民族 在接受汉文化影响的同时，也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汉文化的家谱。据现在世的一些居都老人叙述，居都人在不久以前也有家谱这一类东西，虽不是每个姓氏都有，但有的姓氏人家有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村 50 年间曾连续几次遭受毁灭性的火灾，许多事物包括家谱早已“灰飞烟灭”了。

现在，居都历史的探寻，就只剩下一条极小的极模糊的若隐若现的“小路”可走了，这就是现存于人们记忆中的迁徙和现今的姓氏或氏族的外部构成情况分析。这样，居都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首先得与各氏族来到居都的迁徙历史相关联了。

在居都（指自然村寨的居都），一共有李、沙、黄、杨、石、周、罗、朱、苏、高、张等十一姓人家。周姓在居都只有一户，男的周友学，仡佬族，时年 31 岁，女的沙庭兰，时年 27 岁，为前几年上门招亲的人户。张姓在居都也有一户，男的叫张顺全，是水城的汉族，时年 41 岁，女的叫李明凤，时年 40 岁。张顺全是 1973 年到此上门招亲而进入居都的。

其他各姓大都是解放前或更早的时间迁来或者常住此地的。有比较明确的进入居都的时间的有以下几姓。

罗姓在居都有两户。

### 【个例 1】

罗焕文（时年 55 岁）、罗焕发（时年 53 岁）是两兄弟，在居都已娶仡佬族的女人生子成家，成为居都仡佬族的一部分了。

在把握居都仡佬族文化共同体时，一般都是针对“大居都”而言的，但具体调查的点和相关的统计数字则是自然村寨的居都。

他们自述父母 1948 年因为在水城县的毕德受到某种灾难（可能是仇杀或者失去土地等）的逼迫，在那里已经无法生存，才逃到这里避难的。他们的父母都是汉族，来到居都的主要原因是罗家的姑姑嫁到了居都的沙家，与沙家是姻亲，故来投亲避难。后来，罗家与李才会家达成关于姻亲方面的协议，即罗焕文他们的姐姐嫁给李家，李家借房给罗家居住，从而使罗家在居都落了脚，一直到解放后好几年，罗家才建好了自己的房子。来到居都那一年，罗焕文 9 岁 罗焕发 7 岁。

石姓在居都有两户，大概是父亲那一辈从保那（距居都五公里处）的一个仡佬族村寨）搬来的。

苏姓在居都有四户，但他们到居都也不过五辈人，约 100 多年前到此地。

#### 【个例 2】

苏姓的四户人家以苏发清为最长，时年 63 岁。他自述说：他们家原是新窑骂支（在六枝境内）的仡佬族，在苏发清曾祖父的那一辈时，曾祖父带着一个儿子到居都来落了脚。离开新窑骂支的原因是兵乱。到居都后，其祖父生下了苏发清的父亲 至此是三代单传 到苏发清这一辈时 才有了苏发清、苏发亮两兄弟。苏发清、苏发亮又有了自己的后代。至此，苏家在居都已延续了五代人。为何选择居都避兵乱，回答是居都是本族人，另外居都这地方外人一般不知道和进不来。

朱姓在居都有两户，分别是时年 31 岁的朱高明和时年 29 岁的朱登祥。由于父亲早死，他们对家族的历史记忆早已消失。他们只记得有曾祖父、爷爷 并一直都是单传 到了父亲这一辈时 才有了两兄弟 但均已早死。可见 朱姓的迁入也不过百年 迁来居都的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朱家有姑妈嫁到了居都。

高姓在居都有六户。这六户中有两个宗属：一是高德昌家族的五户；二是高学文一户。后者明确地知道是 1960 年才来到居都的，其父解放前在侬那居住过很长一段时间。前五户自述他们不知道是从哪个年代迁入的，但根据他们苏姓与李姓的亲戚关系，年代不会很早，也不会太晚。

杨姓在居都有五户。问及他们祖上是什么时候到居都来的，都说不太清楚，好像在有意回避什么。但居都对解放前和更远时间的居都历史有一种说法：“李家的武 杨家的富”似乎他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曾是此地的富户，再有后山杨家道光年间的坟墓，应该说杨姓人家至少是清中期或更早一些的时期就在居都的。

黄姓在居都有六户，进入居都的年代不明，但肯定不会太久远，他们也没有自以为来得很久的观念。

沙姓在居都有 11 户，是仅次于李姓的大户姓，但这 11 户沙姓又分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明确地知道是在前五辈人时，从六枝平桥搬来的。据知，很久以前，平桥一带的沙家是一个仡佬族大姓，人丁很旺。现今的岩脚六枝境内的哪度村还有沙家的家谱。这部分人家有九户。另两户为沙明学和沙正洪家，是解放前从侬那搬来的，是侬那的沙家，与平桥来的沙家又不一样。

李姓在居都有 46 户，分三个宗属：一个是以李发胜为长房主事人的宗属；一个是以李明德为长房主事人的宗属；一个是以李天禄为长房主事人的宗属。三个宗属分别有 28 户、8 户、10 户。

李明德宗属的人在自述中也承认他们大约是在六代人之前从岩脚的左坝搬来的，可这宗属的李家人却并不愿叙述他们的迁徙历史，好像不愿口头上承认在进入居都的时间上比李发胜宗属来得要晚的客观现实。但坡头上居住的与他们有血亲关系的另一支李姓人家的自述，却从侧面证实了他们的进入时间。

### 【个例 3】

李庭荣的小儿子李才有自述。他时年 75 岁。

李庭荣在辈份上是李明德的爷爷。在他年轻时，由于在岩脚左坝受人欺压，失去了田地，就通过李明德的亲爷爷辈的亲戚关系，迁到了距居都不远处的坡头落了脚。李庭荣夫妻到坡头后，生下了李才学、李才旺、李才有三子，三子又传下了李广发等 9 兄弟，李广发、李广明等几兄弟又已生子，一共已有四代人了。在他们来到坡头的时候，李明德他们的祖父早已从左坝来到居都很久了。

李庭荣一家到坡头距今约有百余年的时间，而先期到来的李明德他们，时间也不会比他们早很多。

李天禄宗属进入居都的时间不太清楚。他们与李发胜宗属有一定的亲戚关系，但很多事象又表明他们与李发胜宗属有许多区别，并不是一个宗属或宗属下的分支。因为他们是可以开亲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宗属。他们进入居都的时间也不会晚。因为在居都的居民中，有一个时期（大致是清代）对他们有一种政治性质的编制，叫“排”约 10 户一排，因而其时有“上排李”和“下排李”的叫法。“上排李”就是今天的李发胜宗属，“下排李”就是今天的李天禄宗属。

至于李发胜宗属，他们在寨上的人数最多、最盛，也自以为来此地最早。但他们的族人还不能自述这宗属人的来源，以及迁徙过程和历史，也没有什么过硬的家族进入居都时间的历史证据。不过，他们的家系最清楚，往上数，可以数到李发胜父亲李成章以上的好几代人。同时，我们又在松林的后山，访查到一为“李成拳”的道光丙申年的坟墓，坟主李成拳与李发胜的父亲是同一字辈的兄弟。

以上是我们根据所能得到的材料的推测，并不希望能有确切的时间年代，但对这一问题，居都的李发旺还有他自己的说法。

李发旺时年 65 岁，是一位热心关注本民族历史文化的人。他

搜集了许多关于民族文化的情况，虽有些偏颇，但亦有许多较珍贵的东西。他说：“苏家是从黑塘的水头寨六枝境内搬来的，沙家是从六枝的平桥搬来的；高家是从六枝歪头坡搬来的；朱家是从岩脚左坝搬来的；黄家、李明德家也是从岩脚左坝搬来的；石家是从倮那搬来的；只有杨家和李家（应该包括李发胜宗属和李天禄宗属）是最初立寨时就来的。”

李发旺所说的其他的人姓迁徙到居都前的大致地点不会有什么差错，但他能记得如此清楚的言下之意也就是：“这些姓的人家进入居都的时间不长，也就不过百年前后的事情。”可他所说的李、杨二姓是立寨时就来到此地的，那么，这个立寨的最初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这恐怕连李发旺自己也说不准确。

这是我从内部对居都历史的探寻。同时，我在它的四周地区的访谈中也注意到了它这方面相关的事象。

在居都西面的一个山坡上，遥遥相对有一个彝族村寨，村寨的名字叫社勒。在这里，我采访了此寨两所最古老的坟墓，年代都为清乾隆年间，它们在年代上都比居都能识别出年代的坟墓要早。故从此看，可能社勒的立寨时间比居都要早，但这也只是一种可能。

那么，居都的最核心的部分是什么时候进入居都的，并以什么样的形式构成今天的文化格局和居都的社区、人口、语言、组织现状的？我以为这还得从贵州的整个历史背景上来再寻找。因为作为这块土地上的居都，虽然小，但它表现的文化事象肯定又与某些历史有一定的关联。

在历史上，濮人变为僚和濮僚，再变为葛佬……仡佬，有一系列的重大的历史变故，都直接影响这支土著民族的生存方式和发展趋向，都多多少少地让这支民族发生种种变异。另外，某些大的历史事件还直接形成对某些支系、宗属、种群的干涉力量，影响他们的流动、迁徙、分布和内在的结构形式。话说回来，如果说居都的存在与某些古老的历史有直接的联系，那是不切实际的；但说它肯

定的与发生在明代的许多历史事件相关联，则是很确实的。甚至可以说，居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它们的产物。今天的居都及其他少数民族生存的状态和方式，与发生在明代的两大事件相关：一是明代屯堡制度的推行；二是在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至成化十四年（1478年）近一百年间的四次仡佬族人与官军的战争。

在明代，明朝统治者在贵州全境推行全面的“改土归流”政策，与之相应的就是官家在贵州沿交通要道设立军事屯堡。明代先后在贵州设屯堡 30 卫。据（嘉靖）《贵州通志》上记载的入黔军户测算，前后约有一百万的屯军和随军人口进入贵州，并且在“天启以后，卫所渐弛，屯军大量逃散。”故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查存仅有 2.6 万人了。从明洪武元年（1368年）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前后 200 多年，明代入黔的军士几乎逃尽。

仡佬族人与官军在明洪武年间至成化年间的四次大规模的战争记载于《贵州图经新志》等史籍中。在《贵州图经新志》中这四次战争是这样记载的：

一、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朝大军经贵州往征云南，西堡（即今安顺普定一带）仡佬族 15000 余人聚攻普安卫所城。指挥使司顾城坚守不出，待围城松弛时，方突击解围。

二、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阿傍领导西堡仡佬族人与官军激战，战绩辉煌，击毙官军 37000 余人，西堡人死 5300 余人，3700 余石稻谷被掠走。

三、天顺四年（1460年），西堡仡佬族人复聚众攻焚屯堡，明朝调集云、贵、川三省官军 35000 人及水西士兵 20000 人前往镇压。战争前后打了三个多月，仡佬族千余人战死，首领楚德彪被俘，许多村寨被焚毁。

四、十八年后，明成化十四年（1478年）西堡仡佬族万余人再次举行武装斗争，分道攻击官军，致使道路梗塞，朝廷又以贵州、湖广兵合军夹击，战争持续了半年，首领坚娄、附五遇难。余部由阿

毛、果诏带领遁入山洞，另一部由卜著、纪复带领据守白崖。官军堵洞燃烧毒药，煽烟入洞，将洞内人全数闷死；并募敢死士兵夜半趁浓雾偷袭白崖成功。战争中，仡佬族人死 2200 余人，130 余人被俘，700 余名老幼被掠走，数千件兵器及牛羊遭抢夺，578 座村庄遭烧毁。<sup>①</sup>

明朝在贵州的屯军筑堡，给贵州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政治的、军事的，以及文化的等等，但相关于居都的是屯军在后期的大量逃散。在屯堡卫的中后期，政治、军事、民族的对立相对松弛下来，从外地来到贵州，又根本不可能回去的军士们，寻求自己的生存出路就成了他们的主题。方式可以是多样的，但“逃逸”却是最彻底的，特别是得到当地民族协助、认同融和式的逃逸最为理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遭到官军的追捕和山民的阻击。我以为，正是这种“逃逸”给居都的形成带来了重要的影响。从地理形势上看，居都这样的地方是“逃逸”再好不过的地方了。实际上，居都仡佬族文化中的一定量汉文化事象也显现了这样的历史情形存在。当然，这里面有诸方面的因素存在，表现是复杂的，后面我还要详述。

另一个对居都有巨大影响的原因是仡佬族人与官军的四次战争。《贵州图经新志》载：“西堡长官司部落皆仡佬。”在洪武年间至成化年间发生的四次战争，可以说仡佬族人是动用了他们最后的“家底”进行了最后一次以民族为名的战争[从这以后，他们再也没有举行过类似的战争了。咸丰四年（1854年）安顺鸡场仡佬族农民曾毓华领导的武装抗粮斗争已不是一次纯粹的仡佬族的民族战争了，而是同苗族、布依族、汉族等共同对抗官军的斗争。并且战争的性质也不同，前者是为了争取民族的生存空间，后者则是为了

历史文献记载见于《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于此进行了归纳整理，这里使用了其部分文字。《贵州古代民族关系史》侯绍庄等著，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1 年版。